

CHENQITUZHANGUOSHIQI

春秋战国时期

GUANNIAN YU SIWEI FANGSHI BIANGE

观念与思维方式变革

丁祯彦 吾敬东著

湖南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新探》

丛书

春秋战国时期 观念与思维方式变革

丁祯彦 吾敬东 著

湖 南 出 版 社

〔湘〕新登字 001 号

春秋战国时期观念与思维方式变革

丁楨彦 吾敬东 著

责任编辑:柔 之 王娅丽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38000 印数:1—1000

ISBN7—5438—0460—3

B·20 定价:8.80 元

总 序

郭豫适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伟大民族之一，就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之久而从未间断以及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来说，确实是世所罕见的。我们今天编辑出版《中国传统文化新探》丛书，其宗旨就是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作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借鉴。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当然是过去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如何正确地对待，却又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批判其糟粕，弘扬其精华。建设现代新文化，离不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因为历史是割不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是历史发展之链上互相连续的环节，而文化的发展本身具有其历史继承性，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假如离开、抛弃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化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难道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传统文化无用论”、“全盘西化论”之所以错误，不仅在于它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有害观点，而且也在于它本身缺乏科学性，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世

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可以互相吸收，但决不能互相取代。我们应当吸收他国优秀文化的长处，更应重视批判继承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对待文化遗产唯一正确的态度。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这深刻地阐述了文艺乃至人类本身，都是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前进的。有所继承和吸收，才能有所发展和进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研究、阐发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丰富的智慧和经验，使之有益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研究和探索。在探讨过程中，学者们将提出各自的研究心得和见解，也可能出现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编入本丛书的著述是各有关作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尊重作者的劳动，当然作者的观点未必全是编者的观点，这是毋庸赘说的。好在我们大家的宗旨、目的是相同的，学术见解上的不同，可以通过百家争鸣，互相研讨，使真理愈辩愈明，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达到我们从事学术文化建设的共同任务，这是我们的衷心期望。

一九九〇年九月于上海

前 言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这是史学家们公认的，尽管他们对这一时代变动的性质的理解有所不同。本书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无论从社会史，还是思想史的角度说，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已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从观念和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种种问题，论著还不多见，本书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利用时贤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所有制）开始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在殷、周时期土地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国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了春秋时期，这个现实受到冲击，这种观念开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始动摇，与此相应，“工商食官”的传统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否定。商品经济发展了起来，城市日趋繁荣；所有制形式的改变与商品经济的繁荣极大地导致了原有社会结构的更改，按照新的现实重组阶级关系的要求被合理的提了出来；并且，上述这样一系列变化最后又必然导致政治结构的重建，权力分配成为几个世纪中人们不断追逐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趋于白热化，社会变革与反变革的对立与冲突在各国普遍展开；由于社会内在机制趋于活跃，出现生机，也由于各国之间竞争、对抗的需要，经济得以广泛地发展起来，社会生活呈健康化发展趋势；而经济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同时，社会传统的危机与结构的松动也为科学技术的勃兴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作为接力形式的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无论是社会变革、经济与政治的建构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等文化的发展又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于是，“士”普遍得到尊重，并成为竞争中的“抢手货”。

知识分子一旦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主角，便立即在各个领域内对旧的传统观念重新进行审视甚至提出挑战。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神的地位削弱了，人的地位加强了，社会进入到一个理性的时代。而理性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折射，也为能动意识的增加注入了兴奋剂；与此相应，对君民关系思考也被提了出来，这表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检讨，这种检讨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一种较原始的民主精神；同时，对于合理社会的设计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各家各派都在尝试选择一个理想的政府和政治。社会在探索中，但这种探索并非是盲目的，而有着很强的理性色彩；与合理社会的设计相伴随，对于理想人格的思考也成为几代知识分子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这既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理智的继承，也

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理智的反思。而所有上述这些讨论又离不开一些最根本的对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关系的思考，即对于名实关系、古今关系的思考。怀疑与否定精神在与保守传统势力的冲突中节节推进，历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观念广泛地被加以接受。而社会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才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章节之间的逻辑联系。

作 者

1991 年 6 月

目 录

一 变革的性质与背景	(1)
(一) 两个前提性的问题	(1)
(二) 西周末年的社会危机	(5)
二 私有制度的拓展	(10)
(一) 西周以前的土地所有性质	(10)
(二) 公有制度的危机及其公私观念的冲突	(13)
(三) 私有制度的确立及其发展	(16)
(四) 土地私有制形成时的某些伴随现象	(21)
(五) 私有制度及其观念的意义	(23)
三 商业经济的出现	(27)
(一) 商业经济的工业发展前提	(27)
(二) 商业的发展	(31)
(三) 重农抑商理论的实质	(36)
(四) 以商业为核心动力催化义利观的形成	(39)
四 阶级结构的重组	(48)
(一) 原有的等级制度与规范和观念体系	(48)
(二) 阶级构成的变化与等级制基础的丧失	(52)

(四) 士与社会重建	(152)
(五) 士与文化重建	(158)
十 人文思想之一：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165)
(一) 由重神到重人	(165)
(二) 孔子、墨子：天人转换期的思想家	(172)
(三) 孟子对人的夸大	(178)
(四) 荀子对天人关系的合理表述	(181)
十一 人文思想之二：对君民关系的思考	(186)
(一) 早期的重民意识	(187)
(二) 儒家君民观的形成与发展	(194)
(三) 法家君民观的形成与发展	(205)
十二 诸子百家对社会变革的总体设想	(213)
(一) 孔子：“为国以礼”	(214)
(二)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	(221)
(三) 孟子：“施仁政于民”	(227)
(四) 韩非：“法”、“术”、“势”	(232)
(五) 荀子：“礼法兼治”与“王霸并用”	(236)
十三 习性之争与理想人格	(242)
(一)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	(243)
(二) 老子、庄子“复归于朴”的自然复性说	(250)
(三) 墨子与荀子的成性说	(254)
(四) 韩非的“自为”人性论	(258)
(五) 儒家的理想人格	(263)
十四 道家学派理论的特殊意义	(272)

(一) “隐士”与道家.....	(272)
(二) 对现实的怀疑与对权威的否定	(275)
(三) “无为而治”与道家的理想社会.....	(282)
(四) “逍遥游”与道家的理想人格.....	(287)
十五 传统与现实冲突的历史考察.....	(293)
(一) 名辩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293)
(二) 古今之争与历史进化观念	(305)
(三) 荀子对先秦名实之辩与古今之争的总结	(311)
后 记.....	(321)

一 变革的性质与背景

西周时期，中国社会酝酿着巨大的危机。原有的制度及其相伴随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奴隶主贵族日趋腐败，它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其灭亡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西周王朝的衰亡可以视作是夏、商、周三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尾声。中国社会这时真可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尚不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他们却能清楚地预感到变化必将发生！不过，在我们考察西周社会的衰亡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变化之前，还有必要重温一下那些与此相关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讨论，这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殷商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这样一些讨论的了解和把握有助于以后对一系列重要现象和事件作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一）两个前提性的问题

在讨论本书所有的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有关对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讨论——这样一个和本书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即是中国封建社会究竟产生或形成于

何时?^①对这个问题,各家的意见很不相同,这里仅提三种:一、西周封建说;二、春秋封建说;三、战国封建说。

西周封建说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在西周已经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不过是封建社会内部两个不同阶段的交替,即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持这种观点的有范文澜、翦伯赞、王亚南、童书业等。按照西周封建论者的观点,春秋战国时代由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领主土地所有制;(二)实物地租代替了劳动地租;(三)直接生产者身分由农奴而变为农民;(四)由诸侯割据称雄转变为中央集权国家。

春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有李亚农、唐兰、杨宽等。这一派学者认为,西周晚年,奴隶制度已发展到日暮途穷的阶段。奴隶在长期残酷的剥削下憎恶繁重的劳动,他们大量逃亡,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生产无利可图,奴隶主便把广大领地割成小块,租给以前的奴隶耕种,奴隶也逐渐转变为农奴。中国奴隶社会开始解体于周厉王前后,到春秋初期的齐桓公时代,这两百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形期。

战国封建说的主要代表是郭沫若。他主要着眼于土地私有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以及生产者身分的改变。他认为,周室东迁前后,由于铁器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井田的

^① 关于封建一说,黄仁宇先生的看法值得注意,他在《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一书自序中注道:“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 Feudal System 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 Feudal System 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 Feudal System 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 Feudal System 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使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

崩溃。私家逐渐肥于公家，下层便逐渐超克上层。在这上下层相克的阶级斗争中，下层者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故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社会的主要生产者由奴隶身份解放了出来，这就意味着奴隶制度的崩溃。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是新兴地主阶级采取革命的手段掌握了政权。^①

本书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采用郭老的说法，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任何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与确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况且各地各国差异较大。总的来说，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大抵都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当然，如果一定要划定一条界线或设立一个标志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可选择在春秋战国之交。

除了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的讨论应有了解外，还应对商周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一大致的把握，这对于我们知晓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的进步极有价值。

多数学者认为，商代虽然是青铜时代，但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木、石器为主。陈梦家认为，虽然殷代青铜铸造技术已极进步，但是用青铜铸造的许多祭器、兵器和一些工具都是属于王室贵族的，自由的“小人”则无从获得青铜制作的农具，而奴隶更不允许用贵重的农具。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发现殷代的青铜农具应该是极合理的，更有助于殷代社会性质的决定。”^②范文澜最初认为殷代农业中可能已经使用金属工具，但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却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殷代农业

① 参见《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陈梦家：《西周文中的殷人身份》，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工具不一定用金属制造，一般的农业生产工具仍是用木制的耒耜。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商代已有了青铜制的农业工具。如李亚农就以为少数富裕的自耕农已使用带有青铜尖端的木犁，少数奴隶主更进一步使用带有青铜尖端的、用家畜拖拉的木犁来大规模耕作。

考古发现对于判断这一时期的生产力状况有极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商代遗址中常见的农具仍然是石、骨、蚌器。但是也发现几种青铜工具，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可能与农业有关。

对于西周生产力水平，多数学者持比较慎重的态度。以铁器问题为例，郭沫若认为铁的发现大约是在西周末年。范文澜也承认，照一般现存材料看来，西周还没有使用铁制生产工具。但他又认为当时已有金属农具是没有问题的。《周颂》所载“钱”、“镈”、“铎”等字形，可以推想为金属工具。《载芟》说：“有略其耜。”《良耜》说：“畎耜良耜。”其中“略”与“畎”都训为锋利，耜刃锋利，当然是用金属。杨宽是主张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但他也同意西周已有相当数量的青铜农具。不过，他认为当时的青铜农具只是在锋刃边缘上有一条金属包镶着，所需的青铜是很少量的。《周颂·臣工》篇说：“庠乃钱镈，奄观铎艾。”几乎把所有重要的农具都列举了，“钱”是有金属锋刃的耕具，“镈”是有金属锋刃的耨具，“铎”是有金属锋刃的收获工具。也有些学者，如徐中舒不同意把铁工具看作是生产力的唯一标志，而主张从生产工具、耕作技术、肥料和田制诸方面的综合状况来判断西周的生产力水平。

关于西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估计，考古工作者所发表的意见很值得重视。他们根据大量发掘的实物，认为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所反映的生产力，和商代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从现有的发现来看，西周的农具仍然都是石、骨、蚌器，只有个别的遗址发现过

青铜甬和青铜罍。^①

而当我们日后走完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段历程，再回过头来看商周生产力的水平，便会深深感到观念与思维的变革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二) 西周末年的社会危机

从已有史料可知，西周社会降至第十代也即厉王时终于矛盾纷起，危机四伏，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里着重考查其中两个方面。

首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种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经·小雅·北山》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屑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安逸享乐，一方面是被统治者的终日辛劳；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一方面是被统治者的衣食无靠。这真实地勾划出了西周末年的社会图景。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其它一些章节中也多能看到，如《小雅·都人士》中描写道：“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彼都人士，充耳琇实。”这里讲的是一个贵族，你看他的穿着打扮，或绸或皮，还佩以华贵的饰物。相

① 参见《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上述判断又得到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支持，对此可参考杜石然等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